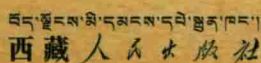


文化历史与社会

赵国栋◎著



茶叶与西藏

赵国栋◎著

文化 历史与社会

金川

པའ་ཕྱུག་པོ་ཚུ་ཡི། རྩོམ་པ།



བོད་ཡུལ་གི་དཔལ་འདེམས་ཁྲི་ཤིང་།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 / 赵国栋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23-04499-8

I. ①茶… II. ①赵… III. ①茶叶-文化史-研究-
西藏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1319 号

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

著 者	赵国栋
责任编辑	李海平 梁惠敏
封面设计	格次 嘎措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拉萨市明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7.5
字 数	47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 978-7-223-04499-8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西藏传统茶文化是个广义的范畴,这源于西藏茶文化与内地茶文化、茶贸易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即西藏茶文化的所有内容中几乎都有内地茶文化的成分或影响存在。以茶马古道形式形成的与西藏有关的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连接着西藏与内地的文化纽带,绵延数百年,经久不衰。研究这一文化纽带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西藏茶文化与周边茶文化所构成的有机体的过程。鉴于此,笔者认为采用社会有机体的研究范式更有利于展现茶叶与西藏之间在文化、历史以及社会之间形成的有机整体。本书将以西藏茶叶及其文化为核心,同时涵盖四川、青海、云南等藏区的有关茶文化、英国与印度的相关茶文化与历史事实,并把与西藏茶文化相关的各类文化现象也纳入其中,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更清晰地感受西藏茶文化的内涵以及与内地茶文化的一体性,感受通过茶叶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空间与现象,从茶文化的视域内透析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化与历史根基。

在书中,笔者运用了“西藏”与“藏区”等相关称谓,在此作简要说明。文中“西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其管辖范围为“六地一市”,即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6个地区和自治区首府拉萨市,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在1663年(清康熙二年)前,虽未出现汉语的“西藏”称谓,但唐时的“吐蕃”、宋代的“西

蕃”、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明代的“乌斯藏”等等实均为“西藏”的不同称谓。文中的非引文内容及无需特别强调当时特定称谓的部分均以“西藏”称之。

“藏区”泛指根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的西藏自治区地方，包括现今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六个藏族自治州，即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

另需要简要说明“西藏”与“藏族”之间的关系。西藏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藏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居住于西藏的既包括藏族，也有门巴族、珞巴族、汉族、回族等其他许多民族。鉴于茶文化的广泛性及在民族间的紧密联系中发挥的重要纽带作用，本书的研究思路并未简单局限于地域，也不完全按民族划分开展，而是总体以西藏为中心——藏族为主体进行有机分析。

在众多文献资料中，尤其英文文献中，由于历史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对西藏(Tibet)与中国(China)、中国人(Chinese)等词汇和称谓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或者是有意的扭曲。比如 Wim van Spengen 的作品 *Tibetan Border Worlds: 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 (2000) 中有许多地方引用他人成果，这些成果在西藏地方与中国关系的表述方面或多或少的存在问题，比如把“中国人”(Chinese)与“西藏人”(Tibetan)相对立并列。^①对此，笔者的态度是，只要不牵涉本书的具体研究，即不作讨论。

书中所使用的资料涵盖了绝大部分涉及西藏传统社会以及今日之社会的与茶文化相关的内容。在对西藏传统社会资料的获取当

^① Wim van Spengen. *Tibetan Border Worlds: 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 Routledge, 2000: 108.

中,调研访问获取的可用资料非常有限,因此研究所使用的资料主要从大量的史料和相关文献中筛选而出,以实地调研考察为辅。史料尽量包括了相关的汉文史料与藏文史料,以汉文史料为主。实证分析素材主要整理自《西藏地震史料》和《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相关文献书籍尽可能涵盖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各类研究成果。实地考察地点包括西藏山南地区、昌都地区、拉萨、日喀则、阿里,四川的成都、雅安、甘孜,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对今日之社会中的相关资料的获取,主要以实地调查为主,同时辅以相关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的查阅。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文文献是笔者努力突破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对印度及二者对西藏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其中茶叶及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并未得到真正的研究,或者研究的力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在那个时间段内,许多英国的间谍、旅行家、政治家以及探险家们涌至印度,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与方法向中国的边缘地带渗透,四川与西藏更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的活动留下了数量较多,又非常珍贵的文献记录与数据资料,排除政治色彩之外,这些内容对研究西藏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从这些资料中选出了一些与茶相关的内容加以利用,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组成。当然,这些资料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流通非常有限,难觅程度之高可想而知。比如Jas Hutchison的*Indian brick tea for Tibet: Report on a mission to Ssu-chuan*,该资料由City Press于1906年出版,共61页。市场中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在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各大图书馆和藏书机构寻找,最终在英国一所大学的某一分院图书馆中找到一本,可谓费尽周折。在长期的外文资料查找过程中,许多师长、同事、朋友与图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让我感动至深。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西藏茶文化之产生与内涵 //1

第一节 西藏茶消费演变概况 //4

第二节 西藏茶文化的内容及演变 //11

第三节 藏茶的涵义 //58

第二章 西藏茶文化与社会生活 //63

第一节 节庆中的茶文化 //64

第二节 风俗礼仪中的茶文化 //76

第三章 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 //107

第一节 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渊源 //107

第二节 藏传佛教中的茶文化 //113

第三节 寺院与茶 //123

第四章 西藏茶文化与西藏治理 //135

第一节 宗教政治传承中的茶 //135

第二节 入藏熬茶 //139

第三节 赐茶 //140

第四节 抵御印茶 //145

第五章 西藏之茶叶贸易 //156

第一节 茶叶之输入 //156

第二节 茶叶之销售 //163

第六章 英国、印度茶业与西藏 //170

第一节 印茶产业状况 //170

第二节 英国支持印茶向西藏之入侵 //183

第七章 边茶与茶商 //206

第一节 边茶的地域性及形式 //208

第二节 边茶茶商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234

第八章 藏区茶叶之贸易 //246

第一节 藏区茶贸易概况 //246

第二节 藏区茶商 //249

第九章 藏区茶文化之纽带作用 //268

第一节 民族间的纽带 //268

第二节 经济纽带 //276

第三节 文化纽带 //278

第四节 地区治理纽带 //282

第十章 四川藏茶文化 //286

第一节 藏茶的生产加工 //287

第二节 四川藏茶之经营贸易 //291

第十一章 西藏茶文化与社会阶层 //308

第一节 茶与贵族阶层 //309

第二节 茶与农牧民阶层 //316

第三节 茶与其他阶层 //323

第四节 不同群体中茶叶消费的实证考察 //326

第十二章 西藏茶文化之实证考察 //345

第一节 数据表 //347

第二节 茶叶分析 //368

第三节 茶具分析 //381

第四节 寺院茶叶、茶具差异分析 //396

第五节 茶与百姓阶层 //401

第十三章 传承创新——社会学视角之探寻与反思 //405

第一节 社会学中的文化路径 //405

第二节 文化功能动态视域 //414

第三节 西藏传统茶文化需要传承创新 //422

附录一 西藏茶馆——文化与产业调查 //427

附录二 西藏察隅边境地区族群文化地理研究 //503

附录三 部分与茶、茶具相关的档案史料 //522

主要参考文献 //583

致谢 //594

第一章 西藏茶文化之产生与内涵

酥油、茶叶、糌粑、牛羊肉是西藏传统社会的饮食四宝。一般认为，茶叶在西藏传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主要源于三点：第一，偏远高寒的居住环境要求，茶叶的多种成分可以充分补充身体所需微量元素，滋润肠胃，促进对牛羊肉的消化吸收，增强体质；第二，传统社会中相对封闭落后的生活状态造成了茶叶的稀缺，茶叶消费主要依靠内地供应；第三，茶叶与藏传佛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巩固了茶叶的社会角色，这种关系造成了一种现象：在宗教世界中的地位与影响大大提升了茶叶在世俗生活中的社会地位。

各类形式的茶文化在西藏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茶文化的运用与强调，以及茶叶与藏传佛教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展现了这一作用。经过一千多年的融合演化，茶（指“茶叶及其文化”。鉴于茶叶及其文化具有一体性特征，因此除特别说明及特指茶叶外，本书中“茶”字代表着茶叶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文化构成。）逐渐渗透于人们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茶在西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形容：酥油茶把干糌粑粘在了一起，使其成为可以吃的食品，从而保证了西藏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

藏族饮茶始于何时学界尚未有定论。西藏同样如此。杨海潮

(2010)通过对早期汉文典籍中茶名称记录的考证,从语言学的视角论证了茶文化约于东汉至魏晋时期传入藏区。他同时指出,不可把茶文化的传入与茶叶或喝茶的传入等同,藏区饮茶应比茶文化的传入时期略晚一些。^①另有研究者认为,据藏汉史料记载,卫藏地区饮茶历史开端于吐蕃王朝时期。《西藏政教史鉴附录》记载,茶叶是随文成公主入藏而被带入吐蕃的。^②

奥夫钦尼科夫(1955)认为,“西藏于公元7世纪发展的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在藏族历史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经济往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自那时起中原的茶叶开始运至西藏,并在之后的几千年间从未间断。”^③也支持文成公主入吐蕃带入茶叶一说。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在其有名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中介绍了西藏早期的历史,他认为:“文成公主带去了宗教用品,还给西藏带去了酥油,茶,奶酪,大麦,啤酒,医学知识和占星术。”^④虽然谭·戈伦夫并未交代这段话的依据是什么,作为一位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汉学家,他显然选择了支持文成公主入吐蕃带入茶叶的观点。还有许多类似的观点,如 Bogoslovskij (1972)主张7世纪末期时中国内地茶叶首次运至西藏。^⑤

也有人认为,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没有找到关于茶的任何信息,由此推论:至少9世纪初以前,饮茶可能只是吐蕃上层贵族的一种享受,在民间仍未

① 杨海潮:《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罗桑开珠:《论藏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及其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③ [俄罗斯]奥夫钦尼科夫:《1955年西藏纪行》,张晓梅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8页。

④ [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⑤ Wim van Spengen. *Tibetan Border Worlds: 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 Routledge, 2000: 107.

形成普遍饮茶的习惯。^①罗克希尔在《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的注释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 313 年至 1260 年,难以确定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西藏可能在 8 世纪前没有喝过茶,喝茶只是近代的事情。而达斯的观点是“茶是在 10 世纪以前传入西藏的,但只在萨迦法王和帕竹诸王执政后才普及开来。”^②Kit Boey Chow 与 Ione Kramer(1990)认为,唐朝时茶饮(tea drinking)之风已经在西北与西部边境地区的蒙古人、鞑靼人、突厥人以及西藏游牧百姓中广泛传播。^③即在唐朝时,茶叶在西藏的传播不仅限于社会上层,而且已经在过着游牧生活中的百姓中广泛传播。目前,其他关于茶叶与茶文化何时传入西藏的观点及依据还有很多,如:随文成公主入藏(贞观十五年,即 641 年),史料依据《西藏政教鉴附录》:“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等;藏文创始时(松赞干布鼎盛时期,约 632—650),依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格勒,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但显然,这里并未明确指出西藏);都松莽布杰赞普时期(676—704),依据《汉藏史集》,记载了都松莽布杰得了一场重病,神鸟衔来茶叶,使其病情好转;唐安史之乱后,依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在安史之乱后的 30 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等等。

针对西藏茶叶从内地传入问题,笔者归纳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西藏饮茶由内地传入,西藏茶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特色;^④唐朝时茶与西藏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藏区人们对茶的认知也随之深入,但此时对茶叶的使用主要集中于药用,饮用较少。

① 任新建:《藏族饮茶历史小考》,《茶周刊》,2004 年,第 44 期。

② [印]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著,[美]W.W.罗克希尔编:《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陈观胜、李培茶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0 页。

③ Kit Boey Chow, Ione Kramer. *All the Tea In China*, China Books, 1990:5.

④ H. Garrison Wilkes. *Interesting beverages of the Eastern Himalayas*, Volume 22, Number 4 (1968), 347—353.

第一节 西藏茶消费演变概况

一、20 世纪 90 年代前

按《汉藏史集》的记载,茶在西藏社会中的出现有着十分神秘的色彩:以神话传说与政治领袖的功绩为依托。相传赞普都松莽布杰得了一场重病,在众人以为无药可治的时候,一只神鸟衔来了茶叶,使赞普病情好转。以此为开端,衍生出了西藏与内地密切的茶业交往文化和独特的等级化的茶叶、茶碗文化(依都松莽布杰的命令,绘有鸟类口衔树枝图案的碗是最上等的茶碗,绘有鱼在水中游图案的碗为中等茶碗,绘有鹿在吃草图案的碗为较差些的茶碗。处于三者等级以下的茶碗,图案和形状由工匠自己决定。于是出现了六种茶碗。按照赞普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策、额策、朵策。)。

公元 842 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间的混战分裂瓦解,出现众多割据势力,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余年。元朝时强化了对西藏的治理。1247 年,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西藏正式纳入蒙古汗国的行政管辖。1354 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同样接受元中央政府统治。1368 年明朝建立后,对西藏采取了“多封众建”政策;陆续建立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重视。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1653 年,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1653 年,顺治皇帝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 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大师的名号。可见,王朝的兴替始终没有动摇与改变西藏作为中国重要组成部分的

事实,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延续,内地茶文化不断向西藏地区及周边乃至全世界传播。在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一般认为1837年后至20世纪初)广泛流传的一句关于中国与茶的俗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Not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意思是“即使给我中国所有的茶叶,我也不会……”当时世界茶叶主要由中国供应,因此“all the tea in China”代表了一笔巨额财富,而该俗语则暗指决心之大,无论什么也难以改变。Sarah Rose于2010年以For All the Tea in China为题完成了一部关于英国间谍到中国盗取茶苗与茶籽再到印度发展茶业的作品(笔者在后文有论及相关内容)。标题的喻义显而易见,一语双关,既指该间谍行动是为了盗取中国茶叶的秘密,又指为了攫取中国蕴藏的巨大财富。该作品(实际为两部)在西方文化界受到了广泛关注。Sarah Rose(2010)写道,在维多利亚时期,“茶叶同样使英国的资本与银行系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其远东贸易网络之快速成长产生了巨大推动力。”^①

在西藏,这种影响更是在不断强化。尤其在茶马贸易形成后,饮茶之风也迅速蔓延,藏族爱茶赞茶,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独特的藏族饮茶文化。有学者把藏族饮茶及茶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初期(吐蕃之知茶)、形成期(吐蕃之需茶)和成熟期(吐蕃之嗜茶)。在知茶阶段,中原地区与吐蕃尚没有茶叶贸易的发生,饮茶风气没有形成;需茶阶段,由官方组织的茶叶运销活动增多,饮茶之风得以传播,饮茶习俗形成;嗜茶阶段,藏族社会对茶的需求已经达到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程度。^②茶的社会价值随着这一总体进程而在不断增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大藏区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仓房堆满了茶包,茶包高过了东山;这是毛主席的恩

① Sarah Rose.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 Arrow Books Ltd, 2010: 254.

② 赵金锁:《藏族茶文化:茶马贸易与藏族饮茶习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情,恩情长过了河川。”^①歌谣把茶包视作最大的社会财富,以茶包之多代表了共产党毛主席恩情之大。

唐玄宗时期,“茶马互市”出现,标志着内地与西藏茶马贸易的正式开端。宋朝茶马贸易繁荣,新出现了多条茶马贸易通道,繁荣了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茶引制”出现,输藏茶叶管理逐步强化。元代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税收管理,征收“茶由”(零售茶税),并在“茶马古道”沿线实行“土官治土民”制度。明朝管理的制度化更为明显,增设了以茶马司为核心的专管机构,并配套实行“贡马赐茶制”。清朝的茶马互市制度逐渐被“边茶贸易制度”取代,茶贸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各民族间因茶叶往来而产生的人口流动随之增多。

从这些标志性事件来看,中央政府对西藏茶叶供给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的,表明了茶对西藏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也是越来越强的。与官营茶马贸易并行的,还有商营贸易形式,但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受到各种压制。清朝雍正十三年(1790),延续700多年的官营茶马贸易停止,商营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来自四川和云南等地的茶商向西藏输入大量不同质量层次的内地茶叶,并出现了专业从事茶叶中介贸易服务的“经纪人”。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曾出现过大量为藏汉贸易服务的经纪人(称为“锅庄”),以类似现在“货栈”的形式为藏汉两地的商人提供各类中介服务。大量存在于四川、西藏和其他藏区内的“茶叶经纪人”角色群体有着较强的生命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专门从事茶叶贸易中介服务的商人的出现,对西藏的茶叶消费与饮茶方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市场意识的日趋浓厚激发了藏汉茶商开辟新的茶叶市场的热情,客观上对西藏茶叶消费以及不同风格茶饮方式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中央民族歌舞团创作研究室:《金沙江藏族歌谣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6页。

1911年至1950年前后,英国向西藏大量倾销印度茶,加之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与剥削,内地输入西藏的茶叶量大幅度衰减。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十分重视对西藏的茶叶供应,扩大了输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1986年,雅安地区茶叶种植面积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3.5倍,茶叶加工能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4倍。基本保证了西藏茶叶需求的满足。与此同时,西藏的茶叶消费量也呈逐渐增长态势,由1955年的人均3.2斤上升至2008年的人均10斤左右。1956年,西藏较大范围试种茶树成功,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几乎遍及西藏南部28个区县。1988年时,西藏的茶园面积就已达3000多亩,1993年自制茶叶已有26万多斤。

二、20世纪90年代后

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加之自然灾害较多,西藏茶园面积及茶产量并不稳定。从表1-1可见,西藏自产茶叶人均占有量非常少,与表1-2的数据对比显示,西藏自产茶在产量最高年份(1995)只能满足人均需求量的2.79%,其他年份满足量更低。所以西藏自产茶远远无法满足自身的茶叶需求,内地茶叶仍是西藏饮茶需求的最主要保障。这一现象也使得传统社会中形成的茶马古道文化与社会互动以现代形式得以实现,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着西藏文化的现代交流与对外传播。

表1-1 西藏自治区茶园面积、茶产量及人均占有量

年 份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面积 (公顷)	149	146	48	133	148	168	128	184	93	69	67
产量 (吨)	66	130	1	1	5	7	1	3	2	1	3
总人口数 (万人)	218.05	235.55	251.23	253.7	255.44	259.21	263.44	267.55	268.58	273.59	279.23
人均产量 (公斤/人)	0.0303	0.0552	0.0004	0.0004	0.0020	0.0027	0.0004	0.0011	0.0007	0.0004	0.0011

注:数据采集自各年度《西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 1-2 西藏自治区人均茶叶消费量 单位:公斤/人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城镇居民消费量	1	1.6	1.4	1.3	0.6	0.5	0.4	0.6	0.6	0.7	1.6
农牧区居民消费量	3.97	2.35	1.77	7.17	2.34	7.83	8.21	7.83	8.31	8.11	4.83
全区人均消费量	2.485	1.975	1.585	4.235	1.47	4.16	4.305	4.215	4.455	4.405	3.215

注:数据采集自各年度《西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 1-2 显示,西藏城镇居民的茶消费量远小于农牧区居民的茶消费量。利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我们对城镇居民人均茶消费量与农牧区居民人均茶消费量的相关性进行检测,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二者呈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610 。说明城镇居民茶消费量越大,农牧区居民的茶消费量相应减少;反之,城镇居民茶消费量越小,农牧区居民的茶消费量相应增加。

进一步检测城镇与农牧区居民茶消费量与城市、农牧区物价指数间的相关性(见表 1-3),发现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物价指数的变动并未对人均茶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在城镇与农牧区的物价指数的相关性检测中,只有肉禽及其制品城镇与农牧区两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呈显著相关关系, Pearson 系数为 -0.833 ;城镇与农牧区的茶及饮料物价指数变量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同样与其他物价指数间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表 1-3 零售价格类指数 (上年=100)

年 份	分类	全区	城市	农村
2003	茶及饮料	103.4	103.8	102.3
	肉禽及其制品	103.3	100.1	108.1
2004	茶及饮料	100.9	101.4	99.9
	肉禽及其制品	107.4	105.1	111.2
2005	茶及饮料	100.1	100.0	99.9
	肉禽及其制品	104.1	107.8	103.7
2006	茶及饮料	100.6	100.3	101.4
	肉禽及其制品	102.3	97.2	108.2
2007	茶及饮料	101.0	101.1	101.0
	肉禽及其制品	118.8	119.3	118.3
2008	茶及饮料	105.3	106.5	101.8
	肉禽及其制品	124.6	128.3	120.4

注:数据采集自各年度《西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在更广泛的检测中,发现三地域内的肉禽及其制品变量相互间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见表 1-4),城镇人均茶消费量与区内肉禽价格指数成负的显著相关关系(Pearson 系数为 -0.821),说明区内肉禽价格的上涨会显著影响城镇居民的茶消费量,影响力为 82.1% 。在显著性水平为 0.1 时,发现城镇居民茶消费量与城市肉禽价格指数两变量的 P 值为 0.075 (<0.1),说明二者也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系数为 -0.767 ,影响力较高。二者产出的分析结果相符。但农牧区居民的茶消费量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即与肉禽类价格指数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可推论农牧区的牛羊肉的自给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 1-4 相关性检测(SPASS 17.0 输出结果)

区 域	城镇人均茶 消费量	肉禽及制品 (城市)	肉禽及制品 (农牧区)	肉禽及制品 (全区)
城镇人均茶消费量 Pearson 相关性	1	-0.767	-0.800	-0.821^*
显著性		0.075	0.056	0.045
N	11	6	6	6
肉禽及制品(城市) Pearson 相关性	-0.767	1	-0.833^*	-0.969^*
显著性	0.075		0.039	0.001
N	6	6	6	6
肉禽及制品(农村) Pearson 相关性	-0.800	-0.833^*	1	-0.943^*
显著性	0.056	0.039		0.005
N	6	6	6	6
肉禽及制品(全区) Pearson 相关性	-0.821^*	-0.969^*	-0.943^*	1
显著性	0.045	0.001	0.005	
N	6	6	6	6

* 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显著相关。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解决“城镇与农牧区的茶消费成反向显著相关关系”问题,即因为肉类价格指数的存在显著影响着城镇茶消费量,但对农牧区茶消费量却并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检测表明,农牧区中茶的消费量与农牧区中肉禽价格指数与茶饮料的价格指数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所以,城镇茶消费量的下降对茶价的影响没有对农牧区茶消费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可以推论:城镇中茶消费量